

有度,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不妨适当降降温,做一点减法,以免动静失调,阴阳失衡,满而招损。

四是天人合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如前所述,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头号大国,奥运会后在环境问题上势将面临日益增大的国际压

力。更为重要的是,环境问题也正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影响社会安定的重大因素。因此,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的伟大智慧,无论是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还是对应对环境问题上的国际压力,建设和谐世界,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之间求平衡

朱 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了新阶段。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中国外交的“后奥运时代”已经来临。如何看待“后奥运时代”?可以从三方面来认识:第一,“后奥运时代”是各种奥运效应发酵、围绕着奥运主办而进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互动关系进一步深化的时代;第二,“后奥运时代”是奥运主办国如何及时、合理与科学地开发和运用好奥运效应、促进国家发展和提升对外关系的时代;第三,“后奥运时代”是“两个大局”的统筹变得更加复杂化的时代。总之,“后奥运时代”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意识”需要明确化、解决问题的“能力建设”迫切化、以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紧密化”的新时代。

目前,西方评价北京奥运会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奥运会大大加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自信心,让中国从举办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中继续热衷于显示实力,中国外交会因此更加积极和具有扩张性;另一种观点是,奥运会大大煽动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强化了中国外交的民族主义色彩,中国外交在“后奥运时代”将会更加具有民族主义的攻击性。显然,西方媒体对中国外交今后发展趋势的这两个判断,很大程度上是情绪化的、不准确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中国媒体宣传当然有爱国主义的一面,但另一面却是浓郁的国际主义,是中国社会和人民在开放、合作和友情的基础上探索和放大的奥运盛事的国际意识。例如,CCTV花了很多时间采访、报道美国游泳运动员菲尔普斯、牙买加运动员博尔特、俄罗斯运动员伊

辛索娃以及日本运动员北岛康介。CCTV5的深度报道节目“奥运荣誉堂”请来了美国体操运动员约翰逊和德国击剑运动员福斯特等。更重要的是,当中国媒体报道了美国传统使用奖牌总数、而不是金牌总数作为奥运奖牌榜的排序方式时,这一美国“算法”在相当程度上被中国所接受。温家宝总理8月23日在会见美国劳工部长赵晓兰时,恭喜美国获得了北京奥运会奖牌总数第一。中国民众相当程度上从以往的“奥运金牌热”中摆脱出来,认同“奖牌数更能反映一个国家综合体育实力”的提法。中国媒体也广泛报道了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的话,他表示国际奥委会绝不鼓励任何形式的奖牌榜“排名”,公开提出过分重视奖牌榜排名的做法有悖于国际奥林匹克精神。中国国家体委主任刘鹏在总结中国代表团的奥运表现时明确承认,中国在多数体育项目上仍然“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在奥运后的宣传以及政策检讨中,都特意强调了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所具有的世界意义,都刻意强调北京奥运会的成功是中国“履行了对国际奥委会的庄严承诺”。例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月25日指出,我们并不认为“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8月25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大标题是“奥运的光荣属于全人类”。奥运会结束迄今各种学术研讨会上的基调,依然是中国必须继续“韬光养晦”,仍然强调“后奥运时代”中国继续保持低姿态的必要性。针对目前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激烈争执,胡锦涛主席2008年8月27日在杜尚别表示,中国希望各方“通过对

话妥善地解决争议”。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后奥运时代”的中国将变得更加民族主义、更加强硬或者更具扩张性。

然而,“后奥运时代”的中国外交自觉防止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干扰、恪守“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轻视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对中国外交的战略拉动,更不能忽视北京奥运会作为中国与世界间即便是感官上的“大碰撞”所产生的对中国外交的冲击。

概括起来说,北京奥运会给中国外交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如何妥善地开发和利用好这笔财富,是长期和战略性的任务。奥运会之所以是一笔“财富”,是因为在筹办和组织北京奥运会的过程中,我们展示了“中国能力”、显示了“中国意志”和清晰地传递了“中国声音”。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不仅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阻挠的结果,是我们坚定、积极开展“和谐世界”外交、与一切旨在将奥运“政治化”势力坚决斗争的结果,更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履行“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和“平安奥运”的结果。北京奥运会对于提升中国国际形象、放大国际关系中的“中国概念”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在“后奥运时代”,中国成功举办奥运的背景又同世界局势出现显著新变化的大背景高度重叠。未来20年,世界局势所出现的新变化至少有三方面的显著特征。一是“西方”作为一个政治、经济与战略的整体正在进一步强化。如果说2003年3月的伊拉克战争导致了大西洋两岸同盟关系的某种“疏离”,那么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冲突以及中国的崛

起正在捏合一个新的“西方”概念,美欧日等西方国家的战略合作将进一步提升;二是在“西方概念”重新鲜明化的时期,世界的财富分配正在向东方转移,同样将是未来难以阻挡的重大趋势。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势力”正在改变世界政治中以往的权力与财富分配结构;三是世界范围内宗教势力的复苏与民族主义意识的复兴,将会重新成为困扰未来国际关系的突出话题。在此背景影响下,中国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国际地位、国际角色和国家战略等诸多相互联系的问题,以便重建实现大国崛起的战略目标所需要的利益、角色与责任这三者之间新的协调关系。

例如,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很难继续保持在“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至少是中国自我国际定位的基础;中国的国际角色不能只是简单地利用矛盾、或者埋头于“韬光养晦”的自我保护主义;中国的国际责任也不能只是一味地追求“外交”与“内政”分离的两条战线模式,或者是单纯通过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和合作来显示中国对多边主义的热情。“后奥运时代”的中国还无法成为世界政治的价值倡导者、制度设计者或者全球权力关系的“平衡者”,但“后奥运时代”的中国外交必须为自己有能力实现未来的角色变化而去发挥战略性作用、拓展活跃的观念影响以及追求大国外交的信誉,以便参与推动世界局势朝着合理、稳定与创新的方向发展。“后奥运时代”的中国有着新的、巨大的国际空间。对这些空间的审视与参与,决定中国外交的未来。

中国与东亚关系的新特点、新趋势

金熙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

当前,中国的快速发展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在中国国内也引发了关于未来国家战略的大讨论。从各种迹象和指标看,中国的发展确实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其总体战略和各项政策都需要创新,

其对外政策也有待调整。其中,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变化是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之一。

这里所说的东亚,是自然地理及地缘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地理范畴。它以东北亚和东南亚各国为